

文章编号:1005-1538(2019)04-0010-08

印尼“黑石号”沉船及其文物综合研究

陈克伦

(上海博物馆, 上海 200003)

摘要:“黑石号”沉船出水了大量中国唐代中晚期的瓷器和一些金属器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通过对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白瓷、绿彩瓷器、金银器、铜镜的造型、装饰及图案等的解读,阐述了中国唐中晚期外销瓷器的总体情况和所包含的文化交流内涵,分析了外销对中国部分窑口瓷业生产的影响。对采集到的两件白瓷标本进行了X射线荧光光谱元素组成分析,探讨了外销白瓷可能的产地。论文也就沉船可能的出发港和目的港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黑石号”沉船;沉船文物;年代;出发港;目的港

中图分类号:K854.1;K86;K876.3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州之间的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丹戎潘丹(Tanjung Pandan)港北部海域的海底发现大量陶瓷和一些木船构件,推测该沉船可能因撞上西北150 m处黑色大礁石而沉没。沉船被称为“黑石号”(Batu Hitam)或“勿里洞沉船”(Blitang Wreck)。持有印度尼西亚政府颁发的考察和发掘执照的德国“海底探索”公司闻讯后对沉船遗址进行定位,并于1998年9~10月间开始海底遗址的发掘工作^[1]。沉船位置在南纬2°41',东经107°35',沉船海域水深约10 m,对沉船的勘察和沉船文物的打捞并不十分困难。经过约一年的发掘,水下考古工作基本完成。

1 沉船及其年代

沉船已经腐朽无法打捞。据勘察,船只建造没有用木钉和铁钉,而是用植物纤维编织的绳索来固定船板;对木材的检测也表明造船材料主要来源于南亚和阿拉伯地区。勘察者从船的制造技术、船体形状和建造材料来判断,船来自阿拉伯地区^[2]。

沉船中的八卦四神铜镜和长沙窑阿拉伯文碗为沉船年代提供了证据:在八卦四神铜镜镜背的外侧一周铸有文字“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於揚州揚子江心百煉造成”;长沙窑阿拉伯文碗的外侧下腹部刻有“□□□□寶曆二年七月十六日”等字样。乾元元年为公元758年,宝历二年为公元826年。考虑到

长沙窑作为一座以外销为主的瓷窑,时效性很强,其装船应该距烧成时间不远。因此该船装货的时间可以推断为公元9世纪前期,即唐代中晚期。

2 沉船文物

从“黑石号”沉船中打捞出来的文物超过60 000件,其中瓷器占绝大部分。长沙窑瓷器为最大宗,有55 000余件,大部分是碗,各类壶约700件;越窑青瓷约250件,白瓷约300件,绿彩瓷器约200件以及其他瓷器约500件。特别是在沉船中还发现了3件唐代的青花瓷器,引起世人瞩目。

沉船中发现的金银器中有金器11件,金箔2 kg;鎏金银器约20件,银锭18件。其他还有铜镜29件、漆器2件、石砚1件、碎墨若干等等。据估计,在第一期发掘中被发现的文物大约占全部货物的2/3^[2]。

2.1 长沙窑瓷器

沉船中长沙窑瓷器的碗(图1)一部分被用稻草扎成圆筒裹住堆放在船舱里,堆得很高接近船板。还有一部分被螺旋状码放在在青釉大罐里,一个大罐往往可以装多达130只。只要大罐没有破损,碗的釉面就不会受到海砂的冲击和磨损,因此长沙窑碗的釉面大部分完好如新。绝大多数碗以及装有碗的大罐都是从船的中央和船尾部位打捞上来的。

700件壶堆放在船舱的前部,没有发现任何包装物遗存。还发现了散落各处的小瓶子,很可能是放在其他有空间的器皿之间。一些带有双耳的小罐被堆放在一起,许多被牢牢粘附在石灰混合物上。

收稿日期:2019-05-23;修回日期:2019-06-26

作者简介:陈克伦(1951—),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陶瓷研究,E-mail: chenkelun@sina.com



图1 长沙窑釉里红碗

Fig.1 Underglaze red bowl from Changsha Kiln

中晚唐时期崛起的长沙窑产品流行书写当时流行的民间谚语、俗语、俚语、诗文等,甚至还有书写器物的用途和窑户作坊的广告,迎合了百姓的欣赏口味,也传播人生哲理及个人情感。

由于长沙窑产品面向普通百姓,以低价参与市场竞争,因此盛销于国内市场,并很快成为外销日用瓷的大宗。特别是“安史之乱”之后,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湘江岸边的长沙窑通过水运能与扬州、广州、安南等地连接起来,使沉重易碎、不适合大规模长途陆运的陶瓷器找到了新的出口方式,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黑石号”沉船上长沙窑瓷器的巨量发现,说明了当时这类瓷器外销的事实。

长沙窑瓷器的造型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碗和执壶。多达 50 000 多件碗的造型单一,圆口(极少作花口)、弧腹、浅圈足,高约 3.5 ~ 5.0 cm、口径约 12 ~ 15 cm。碗内满釉、碗的外壁半釉。执壶为圆口稍外侈、直颈、圆肩,直壁、平底,执壶的一侧有六方形的短流,另一侧则有用两根泥条做成的执手,在流和把手的另外两侧各有一个双复系。执壶高约 20 cm。

长沙窑装饰为釉下彩,以氧化铁和氧化铜作为呈色剂。在氧化气氛中,铁呈现褐色,铜则为绿色。在偶然的情况下,铜也会被还原而呈现红色。长沙窑碗绘彩在碗的内壁,题材除了常见的简笔花卉与树叶、云气纹、山水纹、漩涡纹及市井流行诗文、俚语等,还有佛教题材的卍字佛塔、摩羯鱼、莲花等。一些过去认为是简笔写意山水画、云气纹和在一些隐藏在图案中的简笔纹饰被专家破译,认为是阿拉伯文^[3]。

壶通常采用模印贴花装饰,及用模具印出装饰泥片,施青釉后在贴花部位再施褐釉,高温烧成后纹饰更加醒目。贴花的内容较多表现域外文化因素,如狮子、椰枣树、婆罗树、波罗蜜树、葡萄、寺庙以及胡人舞乐等。

2.2 越窑青瓷

“黑石号”沉船中出土的越窑瓷器数量并不多,造型却十分丰富,包括海棠式大碗、海棠式杯、花口碗、玉璧底碗、香熏、大型唾盂、刻花盘、刻花方盘、执壶、盖盒等。

海棠式大碗 1 件。碗作海棠式,碗口呈椭圆形,对称有四出花瓣,圈足外卷,足底施釉。与此碗造型相似、大小相当的仅见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海棠式大碗,高 10.8 cm、口径 23.3 cm × 32.2 cm。仔细比较两者,存在的区别有以下二处:其一,上海博物馆之海棠碗釉面莹润光亮、釉色纯正;“黑石号”出土之海棠碗釉面呆滞失去光泽,釉色略显发白,盖因经海水长期浸泡所致。其二,上海博物馆海棠碗的花口比较明显;“黑石号”海棠碗仅在碗口下沿作花瓣状凹入,口沿部分的凹入并不显著。

海棠式杯,出土数量相对较多。器形较小,花口十分明显,圈足较浅,足底施釉。“黑石号”还有一类海棠杯,器物呈椭圆形,只是在其口沿部分象征性地对称刻出四处缺口,好似花瓣之间的凹下部分。类似器物在浙江慈溪上林湖唐代晚期窑址中都有发现。海棠式大碗和海棠杯的造型始于唐代,应该是受到西亚地区金属制多曲形器皿的影响而出现的。

“黑石号”上的花口碗造型比较丰富,主要有莲花式碗、深腹碗及花口碗。莲花式碗口沿稍敛,碗口作四出莲花瓣形,花瓣造型比较细致,腹部不见凹入的花筋。深腹碗腹壁陡直,口沿外撇,圈足外卷,其腹部有四处出筋,口沿没有作花口形。花口碗通常为敞口,口沿作四出或五出花口,腹部有相应的出筋,圈足较矮,有的碗的内壁还有刻划花卉,以宝相花、莲花多见。除莲花式碗较少见外,深腹碗和花口碗均是常见器物,在浙江越窑唐代晚期窑址中都有发现。

玉璧底碗是越窑最常见的器物,“黑石号”中发现的玉璧底碗足底心施釉,是越窑同类器物中比较精致的一类。一些玉璧底碗还做成花口形,有四出花瓣。

钵为敛口,弧腹,圈足外卷。通体青釉,釉面滋润匀净。

出土的越窑青瓷盘有圆盘和方盘两种,盘均较浅。圆盘作成四瓣花口形,盘心有刻划花,常见线条奔放的牡丹纹;方盘多作成倭角方形,亦有刻划的花卉纹装饰,其造型与同船所出的金盘相类似。

四系大碗口径估计为 30 ~ 40 cm。敞口、翻沿,圈足,口沿下两侧对称各有两个双复小系,估计为穿系绳索便于提携所用。通体素面无纹,青釉匀净、莹润。

唾盂,器物甚大,撇口、束颈、圆腹、浅圈足。通体青釉,釉面光滑,足底无釉露胎。如此硕大的唾盂在越窑青瓷,以至在唐代瓷器中均十分罕见,其用途似乎超出了唾盂的范畴。

香熏,整体呈覆钟形,直壁、高圈足外撇、盖顶圆隆、有钮,盖上花形镂空各异,焚香时香气从中溢出,有的圈足足墙上亦有长条状镂空。器物通体施青釉,盖沿及圈足内圈有条形支烧痕。

执壶(图2)造型为唐代越窑所常见,敞口、翻沿、束颈、斜肩、鼓腹、平底,一侧颈、肩之间有双股曲柄,另一侧肩部有多棱形短流。还有一类执壶壶体稍大,肩部稍挺,腹部呈瓜棱形,颈、肩间对称各有一个双复小系,也是越窑的常见器物。



图2 越窑执壶

Fig.2 Ewer with handle at the side from Yue Kiln

背壶,杯形口、束颈、扁腹、平底,壶身两侧各有两个桥形系,便于穿带所用。壶身有刻划的花卉纹。

盖盒,盒盘较浅、盒盖隆起、底内凹,子口处无釉露胎,底部满釉,有一周不规则的三角形支烧痕。

越窑青瓷是唐代南方瓷器的代表。公元8—9世纪时期的越窑青瓷沿海上陶瓷之路外销到亚洲至非洲的广大地区,是中国外销瓷的重要品种。大部分唐代越窑外销瓷器保留了本土的风格,有一部分越窑外销瓷器考虑到销往地的宗教文化因素,其造型和纹饰具有异域文化特点。

关于唐代越窑瓷器的外销,文献上缺乏记载;国外一些遗址发现的越窑标本提供了研究的资料。在以往几十年中,先后在东非的埃及福斯塔特遗址、苏丹阿伊扎布遗址,西亚的伊拉克萨玛拉遗址、伊朗尼沙布尔遗址、希拉夫遗址,东亚的日本九州博多遗

址、筑野遗址、奈良平城京遗址,南亚印度河流域的班布尔遗址、阿里卡美遗址,东南亚的菲律宾卡拉塔冈遗址、马来西亚沙捞越尼雅遗址等地发现越窑瓷器的标本。唐代中国主要的贸易港口明州(宁波)、扬州等地的遗址和沉船中也发现了数量不少的越窑瓷器。

从“黑石号”上瓷器所占的比例看,越窑数量较少,由此尚不能据此认为越窑瓷器在当时中国外销瓷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多,在世界各地发现的唐代越窑瓷器标本足以说明越窑瓷器也是当时中国外销瓷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黑石号”上的越窑瓷器品种与供应中国市场的基本一致。同船的长沙窑瓷器却在器物的装饰上迎合了阿拉伯地区的喜好。这样,可以从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瓷业在唐代已经有较明确的分工,越窑产品主要是供内销,它不会或很少为外销特别生产不同的产品。而长沙窑则完全是为了外销而兴起,其彩绘装饰及其图案内容是根据输入地区的喜好、流行时尚而设计制作的^[4]。

2.3 白瓷

“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白瓷约有300件,造型主要有杯、杯托、碗、执壶、罐、穿带壶等。

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柄的敛口杯,一类是单柄的撇口杯。杯托呈盘形,盘沿坦平,盘心凹入以承杯体,盘口作四瓣花口。单柄杯和敞口杯在国内也有发现,如江苏徐州奎山唐墓出土的白瓷单柄杯^[5]和1957年河南陕县湖滨区出土的白瓷圈柄杯^[5]即是。

碗的腹部较浅,斜弧壁,有的口沿外卷,均为四瓣花口。

执壶作敞口、短颈、鼓腹、敛足、平底,肩部一侧有圆形短流,另一侧有双复柄与口部或颈部相连。

罐的口部较小,口唇外卷,肩部圆弧,腹鼓出,下腹收敛,下承小平底。

穿带壶仅见一件,造型为圆形而与传统的穿带背壶略作扁体有异,口部膨出,细颈,斜肩,腹下部隆起,下接圈足。肩部两侧有用于穿带的扁形方系,系下腹部各有两条细突棱,与之对应圈足两侧有扁方孔用于穿带。

除执壶和罐为平底外,其他器形均有圈足,圈足一般较浅。碗多为玉璧形底;杯少量为玉璧底,大部分为较宽的“玉环”形圈足;杯托则都为“玉环”形圈足。

从胎、釉及制作工艺上看,这些白瓷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精白瓷,胎质细白,釉质润泽,器壁较

薄,造型规整;另一种制作较为粗糙,胎质较粗松,器壁较厚,釉质较浊,胎、釉间通常都施白色化妆土。由于这类白瓷釉质地的原因,打捞起来时釉层大都已经剥落。

从中国陶瓷发展的历史来判断,这些唐代白瓷应该基本上都是中国北方窑口的产品,但是它们是否都是一个窑口的产品,抑或产地不止一处? 如果从造型上看,杯、杯托并不是传统唐代白瓷中常见的,它们更接近于当时的金银器造型;花口碗虽然与唐代的造型一致,但依然无法确定它是邢窑或者是曲阳窑的产品;其他如执壶、罐等也是如此。有学者

从胎、釉及制作工艺上来区别,认为精白瓷属于邢窑产品,而施化妆土的粗白瓷属于河南巩义窑产品。但是,在邢窑窑址采集的标本中,既有精白瓷,也有上化妆土的粗白瓷。因此尚不能以是否有化妆土作为判别产地的根据。

笔者有机会得到两件“黑石号”沉船中的白瓷标本:一件是胎薄釉润的精白瓷;一件是施有化妆土的粗白瓷,由于釉层已被海砂侵蚀殆尽,表面即是化妆土。通过 QuanX 型能量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仪(XRF)对这两件标本的胎、釉及化妆土成分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黑石号”沉船白瓷标本分析结果

Table 1 Composition analyses of two white porcelain samples from the Batu Hitam shipwreck

(%)

编号和部位	Na ₂ O	MgO	Al ₂ O ₃	SiO ₂	K ₂ O	CaO	TiO ₂	MnO	Fe ₂ O ₃
精 1 - 胎	0.79	0.70	30.96	64.89	0.68	1.20	0.26	0.02	0.45
粗 1 - 胎	0.43	0.40	30.95	63.55	1.76	0.74	1.12	0.00	1.02
精 1 - 釉	1.61	2.94	15.73	69.16	0.81	8.41	0.07	0.11	0.72
粗 1 - 化妆土	0.95	0.54	31.95	52.33	1.25	11.14	1.01	0.005	0.69

对比用相同仪器对唐代邢窑、曲阳窑和巩义窑窑址出土的标本胎釉的测试数据,结果发现:

- 1) 邢窑和曲阳窑无论是胎还是釉,它们各项指标都非常接近,至少从常量元素上很难对二者进行区分;
- 2) 巩义窑与邢窑、曲阳窑在钠、镁、钾、钙、钛和锰等元素存在明显的差别,足以区分产地;
- 3) 从标本胎的氧化铝含量较高看,“黑石号”白瓷标本无疑都属于北方的产品;
- 4) “黑石号”沉船中精白瓷标本的胎、釉成分与邢窑、曲阳窑标本存在较多的相似性;
- 5) “黑石号”沉船中粗白瓷标本胎的成分与邢窑、曲阳窑标本差别较大,而与巩义窑标本比较接近,特别是钠、镁、钾、钙、钛和锰等元素。

由于所得到的“黑石号”白瓷标本十分有限,因此以上只是初步分析。尽管目前尚未能确定“黑石号”沉船精白瓷的确切产地,但是通过以上分析至少可以知道当时外销的白瓷既有河北的产品,也有河南的产品^[6]。

2.4 白地绿彩瓷器

从“黑石号”沉船遗骸中打捞上来的遗物中发现了约 200 件白釉绿彩瓷器。

白釉绿彩瓷器的装饰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体内外饰绿色,表面通常有垂流现象,并露出彩下白釉。另一种是在白釉上饰以不规则的绿彩斑块。器形主要有杯、高足杯、盘、碗、盖盒、盖罐、执壶(图 3)等。



图 3 白釉绿彩狮柄执壶

Fig. 3 White - glazed green - colored ewer with a lion - shaped handle at the side

从这些白釉绿彩瓷器的造型看,杯的造型直口、深腹,与沉船发现的白瓷敛口杯稍有区别,由于白釉绿彩杯的口径稍大,其高度显得稍矮。另外,白瓷杯的表面没有任何装饰。单柄杯和敞口杯的造型与白釉杯相似,而与国内出土的敞口杯相比,“黑石号”沉船中白釉绿彩杯的口径和腹径略大,高度要矮一些,杯柄上的“指垫”也不一样,前者是利用圆环泥条一端上挑自然形成,后者则特别加上有印花的圆形泥片作成。高足杯在唐代陶瓷器中比较少见,特别是高足吸杯在唐代陶瓷器中几乎不见。盘、碗的

造型为唐代常见。沉船中发现的盖盒较大,与唐代流行的作化妆品盛器的盖盒不同。盖罐与唐代的无异,1992 年在河南省巩义市(原巩县)北窑湾唐大中 5 年(公元 851 年)墓中出土的白瓷盖罐^[7]与沉船中发现的绿彩盖罐器形完全相同。类似沉船发现的狮柄执壶在国内也有出土,如陕西省西安市 004 工地主厂区出土的“白釉执壶”和陕西省西安市西郊热电厂唐墓出土的“白釉狮柄执壶”^[8],应该都是河北邢窑的产品^[1]。

在“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白釉绿彩瓷器国内发现并不多,见于报道^[8-9]的有:1957 年河南安阳薛庄唐墓中曾经出土一件白釉绿彩瓷执壶;1987 年河南省三门峡市化工厂工地唐代墓葬中也曾经出土白釉绿彩瓷碗;1983 年在江苏省扬州市三元路曾经出土一件白釉绿彩贴花龙纹碗,口沿作四出花口、外侈,腹壁斜直,碗心盘龙云气纹贴花与“黑石号”发现的同类碗几乎完全一样^[1]。

关于唐代白釉绿彩瓷器的产地有几种推测,一种认为其装饰与河南巩义唐三彩相似,可能是巩义窑的产品;从个别器物底部刻有“进奉”、“盈”等款识来看,也可能是河北邢窑的产品,因为在邢窑窑址出土的白瓷标本^[10]和一些地区出土的白瓷^[11-12]上发现刻有“盈”、“翰林”等字款。如果从巩义唐三彩的装饰特点看,通常比较多的是在绿色上加白色斑块,而白底绿彩的确实很少见^[1]。传世文物中,故宫收藏的白釉绿彩瓷罐^[5]与“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造型相仿。

近年,有学者通过测试分析比较邢窑、巩义窑、耀州窑及“黑石号”标本的化学构成,认为“黑石号”上发现的白釉绿彩瓷器是河南巩义窑的产品^[13]。由于所分析的“黑石号”标本样本只有 8 个,还不足以反映“黑石号”白釉绿彩瓷器的全貌。2011 年在河北省内丘县发现唐代邢窑窑址,出土的白釉绿彩瓷片标本特点与黑石号发现的几乎一致^[1]。

以上,说明唐代“黑石号”沉船上的白釉绿彩瓷器中既有河南巩义窑的产品,也有河北邢窑的产品。巩义窑产品胎质较粗,有的在胎的表面施白色化妆土;而邢窑产品胎质较细、较白,一般不用施化妆土^[1]。

2.5 关于“盈”和“进奉”款瓷器的讨论

唐代“盈”字款的瓷器,曾引起长期的讨论,一般认为这种瓷器会进入皇室的大盈库,故有“盈”字。由于多出土于邢窑窑址之中,人们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即带“盈”字款的器物,即为邢窑产品,年代为 9 世纪初之后,是供皇室享用的瓷器。“黑石

号”沉船上发现带有“盈”字款的器物,似乎应是河南巩义窑的产品,也就是说带有“盈”字款的器物并非仅有邢窑独有。此外还应该注意的,如果按以往的结论,带有“盈”字款的器物是要进入皇室的大盈库,供皇室享用的瓷器,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黑石号”沉船上?“黑石号”沉船上的物品是商品,也就是说在市场上也可以买到“盈”字款的器物。参照以往的发现,“盈”字款的白瓷,除了在唐长安大明宫外,在西安西明寺、青龙寺、唐新昌坊也有出土,而且也在邢台市、河北易县并非是高级贵族的唐墓中发现,可见把“盈”字直接与大盈库对号入座看法还应仔细斟酌。也许带有“盈”字款的器物在唐代供皇室宫廷使用,却并非是专用,在民间和市场上也有使用和出售。同样道理,“黑石号”沉船上还有刻“进奉”字款的白釉绿彩瓷,说明“盈”、“进奉”字款的器物也会流入市场^[14]。

2.6 青花瓷器

最引人注意的是在“黑石号”沉船船舱的尾部发现了三件青花瓷盘(图 4),这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青花瓷器。三件青花盘的造型基本一致,纹饰不完全相同,但其构成和母题如出一辙。



图 4 青花盘

Fig. 4 Blue - and - white porcelain Pan

在 1975 年扬州唐城遗址发现青花碎片之前,关于中国青花瓷器的发生及发展通常认为是元、明、清时代。1975 年和 1983 年在扬州唐城遗址先后发现了青花瓷残片^[9,15],纹饰中的棕榈叶纹、菱形纹、梅花点纹、竖条纹等具有伊斯兰风格,学者们在肯定这些青花瓷片的年代为唐代的同时,推测它们是为满足国外市场需求而烧制的^[16]。“黑石号”沉船中的青花瓷盘纹饰与扬州唐代遗址出土青花残片纹样风格十分相似,而这种纹样在唐代陶瓷器中罕见。“黑石号”沉船中的三件青花瓷与中晚唐瓷器同处于一艘船上,说明其来自中国,证实唐代已经用钴料

作釉下彩烧制青花瓷,并且已经输出海外^[14]。

考古发掘证明,河南巩义黄冶窑既烧白瓷又烧三彩陶器,在其晚唐地层中还发现胎质纯净、火候较高的白釉蓝彩残片,呈色剂是氧化钴^[17]。从条件上说,黄冶窑具备了烧造青花瓷的条件^[14]。“黑石号”沉船上青花瓷盘其中一件釉面有剥落,可以看出其制作工艺是成型后先施一层化妆土,在化妆土上用氧化钴绘彩,施透明釉后入窑高温烧成。这与巩义黄冶窑的制作工艺一致。

2.7 金银器

“黑石号”沉船上的金银器包括一件金杯、三件海棠式杯、两件方盘、一件圆盘以及两件类似耳坠的残件等。

金杯(图5)八方形,一侧有以圆形金条盘筑的圆环形柄,柄环上端与一圆形印花指垫相连,这种做法与单柄白瓷杯类似,杯体下承花型圈足。金杯的每一个面都有胡人手持乐器或果盘跳舞的形象。金杯的装饰与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杯相似,具有粟特风格,但器物更大、更重。三件海棠式杯作椭圆形,敞口、直壁、在四角各有一道凸棱,圈足,其造型与沉船中发现的越窑海棠式大碗基本一致,其中一件素面,两件刻有飞禽花卉图案,纹饰分三个层次,口沿内侧为连续的珍珠地弧形三角纹,内壁为四组花卉,内底外沿一周花瓣,中间为珍珠地花卉,两只飞鸟上下穿行其间。两件方盘通体珍珠地,委角、盘身较坦、翻沿,口沿一周叶纹,四壁为四组花卉,盘中央为以阔叶纹组合成的卍字,在四组花卉之间和卍字的四角各有一个振翅的蜜蜂。在一件方盘外沿的一侧刻有“七两二銖”(约303 g)。圆盘亦为四出花口、坦身、翻沿,通体珍珠地,内沿一周勾连如意纹,盘壁有四组阔叶环绕花卉的椭圆形图案,中间为一方形以扇形纹饰围绕的四瓣花卉,在椭圆形图案之间各有一个振翅的蜜蜂。



图5 金杯

Fig.5 Golden cup

沉船发现的鎏金银器由于海水侵蚀,表面金大都已经脱落。有海棠形、菱花形、扇形的盖盒,圆盒、盘和提梁壶等。盒盖在珍珠地为浮雕式的立体花纹,通常为缠枝花卉环绕的动物,有飞鸟、奔鹿、蜜蜂等;盖盒底部则以线刻花纹装饰,有缠枝花卉及飞鸟、蜜蜂等。圆盒较大,盒盖珍珠地,以不同的花卉、飞鸟及鸳鸯组成图案,非常逼真。提梁壶有盖,盖面圆隆,圆环为提手。扁体,两侧有环形耳与扁形提梁相连。壶身通体珍珠地,以线刻的花卉、飞禽装饰。在一件银圆盘残器上有犀牛纹样,这并不多见。

金银器纹饰是采用鑿刻的工艺做成。除了方盘比较少见,其他器物在唐代考古中都有发现^[14]。装饰纹样有的具有外域风格,这与唐代对外交流频繁,吸取各种文化因素有关。

这批金银器的有可能是在扬州一带制造的。据记载,8世纪中叶以后,岭南道、江南道一跃成为金银器制作原料新的供应地。9世纪初出任淮南节度使的王播,曾三次进献皇室金银器皿,数量多达5900多件^[18-19]。

2.8 铜镜

在沉船上发现了29面铜镜。发现时大部分镜子被石灰质沉积物覆盖,镜面已经腐蚀,许多已经变成了黑色。最初,铜镜大多是银色的,使用面平整而光亮,用于映面照形。为了达到如此明亮的颜色,在制作铜镜的合金中加入了更多的锡。唐代铜镜平均由含69%铜、25%锡和5.3%铅的青铜铸成。

沉船上的铜镜多是唐代流行款式,有圆形、菱花形、葵花形、莲花形和方形等。铜镜背面的装饰题材有海兽葡萄、狮子葡萄、绶鸟、真子飞霜、八卦四神等。此外还发现了一件汉镜。

八卦四神镜上有一周铭文:“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於揚州揚子江心百煉造成”,不但为确定沉船的时代起了作用,而且成为文献记载的“江心镜”考古实物。产于扬州、扬子江制造的“江心镜”费工费时,难以制成,又被称为“百炼镜”,供给宫廷使用^[20]。它出现于8世纪的唐玄宗时期(712—756),唐德宗(779—805)继位时,因提倡节俭而被罢去^[19]。《异闻录》记载“江心镜”的样子:“唐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镜一面,纵横九寸,青莹耀日,背有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势如生动,玄宗览而异之……”^[20]。唐人对这种铜镜熟知并喜爱,白居易作有“百炼镜”诗,诗的最后劝导天子不要沉迷于奢侈,而要关心四海的安危。

3 “黑石号”沉船的出发港和目的港讨论

关于“黑石号”的出发地,有三种推测:其一,“扬州说”认为“黑石号”沉船在扬州装载长沙窑(长沙窑产品沿湘江而下,经洞庭湖而入长江到扬州)等货物后出海,然后沿着海岸线至明州、广州等地停靠,并装上当地的货物,行驶至今苏门答腊附近沉没。在扬州发现较多长沙窑产品的遗存和与“黑石号”相同的绿彩、青花瓷器以及扬州地区生产金银器,为“扬州说”提供了依据。

其二,“广州说”认为“黑石号”在广州装上溯湘江而上,经灵渠到广州的长沙窑产品,再按照“广州通海夷道”中的路线行驶至苏门答腊附近^[21]。一部分长沙窑碗被装在广东生产的青釉大罐再装船,为“广州说”增加了可信度。

其三,认为“黑石号”沉船上的货物是在室利佛逝(唐代末年以后改称三佛齐,即苏门答腊岛)的港口一次性装载的,而这些装上船的货物则是由不同的船只从扬州、明州和广州分别运到室利佛逝的^[21]。

有学者认为,如果是扬州出发,不能解释广东青瓷大罐如何到扬州再装载长沙窑碗;如果是广州出发,在广州的唐代遗址很少发现长沙窑产品;而第三种较为妥当,但亦有可斟酌之处^[21]。

室利佛逝等东南亚港口有作为中国货物输往西亚、中东、欧洲中转港的悠久历史,这种情况至少维持到明代。中国的货物输往西亚、中东或者欧洲,依靠中国商船的航海能力可能有一定的困难,而西亚和欧洲的商船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此在东南亚中转成为海上贸易最好的选择。事实上在这些港口的古代遗址中经常发现中国的外销瓷器。如果“黑石号”确实是在室利佛逝港装载了来自各地的货物启航的,那么,不久它就触礁沉没了。

也不能排除“黑石号”是从中国的港口启航的。船上的货物如金银器、“江心镜”产自于扬州,各地窑场的产品运到扬州也不存在很大的困难,而且在扬州唐代遗址发现了除广东青瓷外其他“黑石号”装载的瓷器品种。唯一的疑惑是关于广东窑青瓷大罐内装有长沙窑碗作何解释?也可以设想“黑石号”在扬州装上除长沙窑之外的其他货物,留出中间的舱位到广州再装载长沙窑瓷器和广东青瓷。

关于“黑石号”的目的港,从目前的考古证据看,应该是西亚、中东地区。“黑石号”装载的长沙窑、越窑瓷器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苏丹的阿伊扎

布遗址,伊拉克的萨玛拉遗址、伊朗的尼沙布尔遗址和希拉夫遗址等地被发现。在柏林佩加蒙博物馆的陈列室里有在伊拉克萨马拉遗址出土的、与“黑石号”一样的白地绿彩瓷器和白瓷,而在欧洲至今尚未有类似发现。因此,“黑石号”的最终目的港应该是阿拉伯帝国的某个港口。

参考文献:

- [1] 陈克伦. 唐代“黑石号”沉船出水白釉绿彩瓷器研究[C]//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辑刊.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
CHEN Kelun. Wares painted with green motif on white ground, from the *Batu Hitam* wreck [C]//Shanghai Museum. Shanghai Museum Proceedings. Shanghai: Shanghai Calligraphy &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2012.
- [2] FLECKER M. A ninth-century AD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 First Evidence for direct trade with China [J]. *World Archaeology*,2011,32(3):335-354.
- [3] 陆芸. 从“黑石号”等沉船出土的物品看古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往来[J]. 学术评论,2017(3):50-54.
LU Yun. Studies of trade contacts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via excavated objects from the *Batu Hitam* and other shipwrecks [J]. *Academic Review*,2017(3):50-54.
- [4] 陈克伦. “黑石号”出土的越窑瓷器与唐代越窑的外销[C]//沈琼华. 2007'中国·越窑高峰论坛论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CHEN Kelun. Yue Kiln porcelains from the *Batu Hitam* shipwreck and export sales of Yue Kiln porcelains in the Tang Dynasty [C]//SHEN Qionghua. Proceedings of 2007' China Summit Forum of Yue Kil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2008.
- [5] 安金槐. 中国陶瓷全集:第5卷[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148,179.
AN Jinhui. Complete works of Chinese ceramics: Volume 5 [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2000:148,179.
- [6] 陈克伦. 唐代“黑石号”沉船出土白瓷初步研究[C]//上海博物馆. 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
CHEN Kelun.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white porcelains from the *Batu Hitam* shipwreck [C]//Shanghai Museum. Proceedings of Symposium on Chinese Ancient White Porcelains. Shanghai: Shanghai Calligraphy &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2005.
- [7]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 河南出土陶瓷[M]. 香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7.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ramic Finds from Henan [M]. Hong Kong: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7.
- [8] 张柏.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ZHANG Bai.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eramic art unearthed in China [M]. Beijing: Science Press,2008.
- [9] 马富坤,王兵,印志华. 扬州三元路工地考古调查[J]. 文物,1985(10):72-76.

- MA Fukun, WANG Bing, YIN Zhihua.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 of Sanyuan Road in Yangzhou[J]. Cultural Relics, 1985(10):72-76.
- [10] 贾忠敏, 贾永禄. 河北省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J]. 文物, 1989(9):1-10, 97-99.
- JIA Zhongmin, JIA Yonglu. Survey briefing on Xing Kiln in Neiqiu County, Hebei Province[J]. Cultural Relics, 1989(9):1-10, 97-99.
- [11] 翟春玲, 王长启. 青龙寺遗址出土“盈”字款珍贵白瓷器[J]. 考古与文物, 1997(6):6-12.
- ZHAI Chunling, WANG Changqi. Precious white porcelain with character of “Ying” excavated from Qinglong Temple[J].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1997(6):6-12.
- [12] 尚民杰, 程林泉. 西安南郊新发现的唐长安新昌坊“盈”字款瓷器及相关问题[J]. 文物, 2003(12):81-88.
- SHANG Minjie, CHENG Linquan. Some remarks on the Tang porcelain bearing the character of “Ying” from Xi’an[J]. Cultural Relics, 2003(12):81-88.
- [13] LI B P, CHEN Y S, WOOD N. Chemical fingerprinting: Tracing the origins of the green-splashed white ware[M]. Singapore: 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11.
- [14] 齐东方. “黑石号”沉船出水器物杂考[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7(3):6-19.
- QI Dongfang. Study on the salvaged antiques from the *Batu Hitam* Shipwreck[J]. Palace Museum Journal, 2017(3):6-19.
- [15] 南京博物院发掘工作组, 扬州博物馆发掘工作组, 扬州师范学院发掘工作组. 扬州唐城遗址 1975 年考古工作简报[J]. 文物, 1977(9):16-30.
- Excavation teams of Nanjing Museum, Yangzhou Museum and Y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Archaeological briefing on Tang Cheng Site in Yangzhou in 1975[J]. Cultural Relics, 1977(9):16-30.
- [16] 马文宽. 唐青花瓷研究——兼谈我国青花瓷所用钴料的某些问题[J]. 考古, 1997(1):73-84.
- MA Wenkuan. Research on Tang blue-and-white porcelain: Some questions about cobalt materials used for blue-and-white porcelain in China[J]. Archaeology, 1997(1):73-84.
- [17] 孙新民, 刘兰华, 赵志文, 等. 河南巩义市黄冶窑址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 2007(4):106-129.
- SUN Xinmin, LIU Lanhua, ZHAO Zhiwen, et al. Excavation briefing on Huangye Kiln Site in Gongyi, Henan Province[J]. Huaxia Archaeology, 2007(4):106-109.
- [18] 王钦若. 册府元龟[M]. 上海: 中华书局, 1960.
- WANG Qinruo. Ce Fu Yuan Gui[M].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 [19] 刘昉. 旧唐书[M]. 上海: 中华书局, 1975.
- LIU Xu. Jiu Tang Shu[M].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 [20] 李昉. 太平广记[M]. 上海: 中华书局, 1961.
- LI Fang. Tai Ping Guang Ji[M].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1.
- [21] 张海军. “黑石号”沉船有关问题再研究[J]. 东方收藏, 2014(11):87-89.
- ZHANG Haijun. Re-studies of some questions of the *Batu Hitam* shipwreck[J]. Oriental Collection, 2014(11):87-89.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antiques from the *Batu Hitam* shipwreck

CHEN Kelun

(Shanghai Museum, Shanghai 200003, China)

Abstract: A great number of porcelains and some metalwares of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were archaeologically salvaged from the *Batu Hitam* shipwreck, providing important material evidence for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hrough interpretation of the shapes, decorations and patterns of Changsha Kiln porcelains, Yue Kiln celadons, white porcelains, famille verte, gold and silver wares and bronze mirrors,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nvolved in export porcelains of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are illustrated, and the influences of export on parts of kilns in China are analyzed. The possible provenances of export white porcelains are also discussed according to the elemental composition analyses of two samples using X-ray fluorescence (XRF) spectrometry.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possible departure and destination ports of the ship.

Key words: *Batu Hitam* shipwreck; Salvaged antiques; Time; Departure port; Destination port

(责任编辑 马江丽)